

第十章

我與蔣經國



第1節 一本日記見真情

我一向有寫日記的習慣，以前每至歲末，蔣經國先生會周到地送來日記一本；那是中央印製廠特別為總統印製的。當然也由總統府分發給一些「高官」使用。我自1951年起每年承賜一本，有時經國先生在扉頁上題些字。1957年送的日記上寫著：「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這兩句話說明了蔣經國與我相交的期許。

蔣經國相識滿天下，但是真正的知心並不多，我有幸蒙他引為知己。自1943年至1966年的二十三個年頭中，我們常見面，尤其是來台後，過從更加頻繁；每週都見面，常去吃小館。蔣經國自奉甚儉，在家中請客，菜色甚為簡單；出外也不講排場，常去峨嵋餐廳吃川菜，或去三和樓和五福樓嚐江浙菜，也喜歡狀元樓的北平烤鴨。

蔣經國和夫人方良喜歡小酌，酒量、酒膽和酒品皆是一流，常見滿座賓客皆醉，座上主人獨醒。蔣經國喝酒也不挑剔，外界崇尚洋酒成風，他獨鍾紹興一沽。

蔣經國沒什麼消遣嗜好，方良喜約瑛華到老友王新衡家打小牌。蔣經國偶爾也下場參戰，但他牌技甚差，完全是自娛娛人。此外，他的運動細胞似也不發達，曾打過幾次高爾夫球，呂良煥充當他的義務指導老師；雖然蔣經國可以左右群眾，卻控制不住一顆小白球，玩了幾次以後就放棄了。後來他指示將台北高爾夫球場改建為青年公園，激起打球的人很大反感。但事後想來，對

台北市民倒是功德一件。

蔣經國出外訪問，也喜拉著我一起去。有次他找我去參觀新店監獄，當時怎麼可能料得到，自己有一天會在這裡耽待上幾個月？人情反覆，世路崎嶇，新店監獄就是見證。

那些日子，我們交往頻繁，形同莫逆。蔣經國看出我性剛人直，不耐惡人俗事，於是在贈我的1958年日記本上寫著：

「智慧比珍珠更美，愚妄人怒氣全發，智慧人忍氣含怒。——錄自《舊約·箴言》。復恩兄紀念；經國贈。台北」

此處可見他心思之細密，與對我期望之殷切。

第2節 我看蔣經國

那麼我對蔣經國呢？二十三年的交往，我對他仍是一知「半解」。

所謂「半解」，指的是我只對一部分的蔣經國知之甚詳。例如有一次在陽明山吃飯，他特別在手掌上寫了四個字要送給孝文，請大家猜一猜是哪四個字。

我隨口答出是「飲水思源」，蔣經國面露驚奇，不解為何我一猜即中。原因是在那段時間，他對孝文很不滿，孝文對父親也頗為反抗，經國欲以此語，警

醒孝文。

還有一次孝文獲女，經請老總統取名，蔣經國又將名字寫在手掌，讓大家試猜。

我寫下「友梅」二字，蔣經國再露驚色。其實當時他正熱中向高逸鴻學梅，蔣夫人也愛畫梅，而蔣家下一代則是友字輩。

我雖猜中，但自覺有聰明外露之嫌，不足為訓，後悔莫及。這是年輕愚鈍之故，爾後亟思改過。

蔣經國的個性，和他在俄國所受的訓練和所吃的苦難，應有相當的關係。他自奉甚儉，自我約束，嚴格要求，完全不重享受，身段和姿態都擺得很低。處逆境能忍，處順境不驕。且對父親極孝順，常要孩子們回家陪爺爺。

但是另一方面，他深藏不露，城府極深，常要讓旁人揣摩他的心思與想法。這種「意識潛伏」，讓下屬摸不透；也許這是建立權威的一種「術」，這也正是我對他「不解」的另一面。相處二十三年，我自認仍然摸不透他的心思。

王作榮先生在其自傳中評蔣經國為「俄國史達林與中國包青天文化的混合產物，思想與行為十分複雜奇特，叫人難測」。「難測」兩字真是傳神。

第3節 戲劇性的初識

我與蔣經國的初識，是在1943年春的重慶九龍坡機場。機場在重慶一個山坡上，只有一條又狹又短的土跑道。那天我飛蔣委員長自成都返重慶，在飛抵機場時，發現落地方向指示（一個T字布）擺在順風；而落地必須逆風才是安全之道，於是我決定逆風落地。此時對面一架C-47也正在順風轉彎進場。兩機雖是迎面態勢，但我判斷絕無相撞可能，就照原定計畫平穩落地。數分鐘後，對面的C-47也到達。那架飛機搭載了蔣經國，他下機後直趨蔣委員長面前行三鞠躬之禮，然後兩人一起搭車離去。

當時蔣經國搭乘的那架C-47，是由德國訓練的飛行員林大綱駕駛，林大綱將當日「兩機對飛」的情況，向蔣經國和蔣緯國告了一狀。於是他兄弟二人就將此事面報蔣委員長，老先生令諭周至柔將軍查辦。數日後，我突獲通告，記了一個大過。而九龍坡機場場長及當時的中國航空公司總經理王廷黼先生更遭到撤職處分，我心中非常不平（九龍坡機場，當時屬中國航空公司管轄）。

王先生是我國航空工程界的先進，曾在美國受訓，據說是全球知名的空氣動力學家馮卡曼（Von Karman）的得意門生。後來王先生仍被重用，派至國際民航組織（ICAO）任中華民國的首席代表。雖然人生曾經逆風，最後仍是安全降落。

我與蔣經國首度碰面，就充滿了戲劇張力，是以「大過」收場。

第4節 贛州和重慶時的蔣經國

那年秋天，我奉命率C-47機三架，運中央銀行鈔票至江西贛縣，交給擔任贛南行政督察專員的蔣經國。當時日本已佔領湖南省大部分，由重慶飛贛州，要經敵人上空，所以我們採取夜航以策安全；靠近衡陽的時候，日軍照例以高射砲配以探照燈，向我機射擊，但當年科技尚差，命中率幾乎等於零。他們的探照燈，我們倒是遠遠地看得很清楚。飛抵贛州落地後，天已微明，於是就把飛機掩藏起來，機員則住進城裡的勵志社。

勵志社，好像是高級軍事將領的招待所。總社設在首都南京，蓋得像宮殿一樣，蔣經國在南京時就住勵志社。當時勵志社總幹事是黃仁霖，很受蔣夫人欣賞，後來在台灣曾任聯勤總司令和駐巴拿馬大使。另有分社，設在各特選的城市。抗日戰爭時，在各軍區成立「志願軍」招待所，先是俄國「志願軍」，後是美國「志願軍」，而這些招待所則均由勵志社人員經營。

我們從冷寂蕭瑟的重慶，飛到畸形繁華的贛州。在這裡，嗅不著戰爭的氣息，燈火通明而商業興盛。重慶禁酒，贛州酒香四溢，人們在戰爭邊緣暫且貪杯作樂，要愁哪得閒工夫。各種商品多由日本佔領區偷運進來，

如瓷器、織錦等，琳琅滿目，價格又便宜。我們到贛州，機員最高興的就是吃和買。我至今仍難想像，為何很多商品由佔領區通過前線，進入贛州而不為日軍查扣？據我所知，我方派赴佔領區之情報人員亦多由贛州滲入，日軍真的無用或故意不管？令人費解！

有一次蔣經國派人到勵志社來請我吃飯。當時空軍有些人對蔣經國有點反感，因為他在江西省保安處長任內，有幾位空軍年輕的飛行員在南昌勵志社裡鬧事，蔣經國派了保安處的一卡車兵來捉拿，大家於是一哄而散。年輕的空軍飛行員為此耿耿於懷，對留俄的蔣大少相當反感。當然，在抗戰初期的空軍飛行員，勇敢善戰，也陣亡了很多，一向為國人所寵，哪能忍受別人欺負？心存這樣心理，我就婉謝了他的好意。後來他親自來邀，我是隊長，不便推辭，但請求可否全組機員都去？他欣然答允，於是我們就到他的幹部訓練團大吃一頓，還參加他們的晚會。據悉，他很多幹部，以後都位居要職，其中多數來自他在贛州的訓練班。

之後，我又奉命去贛州把蔣經國的家眷，包括方良女士，長子孝文、長女孝章及其他家人接回重慶，安置在九龍坡的一處官邸。後來戰事吃緊，日軍逼近贛南，我又奉命去贛州接運蔣經國本人。其時贛州完全變了樣，只見烽煙，不見燈火，繁華落盡，田園寂寥。

蔣經國身著長袍，在專員公署指揮疏散，並指示將通往機場的贛州大橋炸毀。當時的蔣經國很有骨氣，

抱著與贛州共存亡的決心；一襲長袍裹著一身傲骨，我首次對他感到敬佩。是時天色已黑，暮色中贛州風雲緊急，危機四伏，日軍已兵臨城下，我軍待命點火炸橋；我與陸軍將領劉多荃費盡唇舌勸說，總算連請帶拉，請他上了車。駛過大橋，緊急登機起飛，我才鬆口氣，可安心交差了。

他到重慶後，我們的交往，開始逐漸加多。有一次，他由西北到成都，先到我家休息，連跟隨他的盛世驥（新疆督辦盛世才的五弟）也帶來，充分流露對我的情誼，卻也同時招來了一些空軍前輩的誤會。於是我建議他去拜會當時的空軍三路司令王叔銘將軍。

王叔銘與蔣經國交情一向不佳，老總統下野，王帶了一小隊通信隊跟著蔣老先生，很得老先生賞識。王對蔣經國態度倨傲，王曾對我說：「我和蔣經國是師兄弟，我不一定要聽他的。」蔣經國也曾私下批評王：「打著老先生的旗子，搖得太厲害了。」

1944年，蔣經國去西安主持緯國婚禮，與方良路經成都時，特別約我同行。那次也是瑛華首次遇見方良，爾後她們成為知交，直到今日，還保持與方良往來者，瑛華恐怕是僅有的一、二人中之一。基於情義，她每隔一段時日就去陪方良吃頓午飯，並認為方良是蔣家最值得同情的一個人，單獨住在「七海山莊」（蔣經國生前的官邸），等於與世隔絕，其情可憫。另外，我在西安也認識了胡宗南和戴雨農等人。

第5節 抗戰勝利後的交往

抗日戰爭結束，我空運大隊忙於「還都」及運兵。1945年我飛蔣委員長夫婦返溪口故鄉，吾妻應邀與經國家人由上海搭招商局「專輪」，到寧波轉溪口。我們在總統故居豐鎬房住了約一週，得有機會隨蔣委員長夫婦暢遊四明風景區，如雪竇寺、上下隱潭，並乘竹筏順剡溪下游至溪口。

1946年，空運大隊抽派飛機送方良一家到杭州定居。他們被安置在杭州西湖邊內湖路1號的一幢二樓別墅裡，除方良、孝文、孝章外，還有女傭汪媽和廚師、司機各一人以及警衛。他們的生活很簡單，由當時杭州中央信託局經理趙聚鈺及夫人趙本琪女士照顧。我夫妻每至杭州，都被招待在他們家住。有一次，我空運大隊同仁到杭州遊覽，蔣方良女士曾在中央信託局大樓宴請全體人員。方良女士一向少在外邊宴客，那次許多小老弟喝得大醉而歸，方良也極盡興。

1989年兩岸開放觀光，我特別回到了杭州內湖路1號。兩層的樓房竟然還在，院子則因道路拓寬而縮小了，房子也斑剝破落。想起四十五年前的光景，內心感慨萬千。氤氳西湖，看盡多少英雄，數遍多少興亡；是非成敗，轉眼成空，直教人唏噓不已。1989年10月，我夫妻二人又邀趙欽夫婦重遊杭州，並去溪口觀光。那裡除豐鎬房外，變得幾乎完全不認得。由溪口可乘汽車直達雪竇寺，當年只有徒步或坐轎上山；目前該寺之規模

比當年何止大十倍，周圍商店林立，令人感到商業氣息竟重於佛家精神。我們去的那天，香火並不盛，睹物思人，不免又憶起往事！不遠處有張學良「舊居」，其他如千丈崖等倒沒有什麼變化。

還都後，蔣經國單身留南京，住進勵志社。我家住在南京，蔣經國成了我家中常客。我家對門公寓，住著經國的堂妹華秀和她丈夫韋永成，我們這三家人經常一塊餐敘。經國當時擁有一輛雪佛蘭轎車，多由他自己開，因此往返非常自由。有時他也參加我們的麻將局。我夫妻間或去他住處吃洋餐，偶爾董顯光博士也加入暢飲。董先生人極隨和，他的愛子世良在我大隊任飛行軍官，所以與我夫妻過從甚密。這項友誼，一直維持到他們過世。顯光酒量不大，在經國勸酒下，常常酩酊大醉。對他的處境，我極表同情，但卻無能力「代酒」！

董世良從小頑皮搗蛋，不得董顯光夫婦喜愛。長大後送入空軍磨練，董顯光心中一直覺得對不起兒子，私下送了我一隻手錶，託我好好照顧世良。可憐天下父母心！但是世良後來轉入CAT服務，還是出事身亡。

第6節 蔣經國初試啼聲

在南京時期，最難忘的一次任務，是北平局勢吃緊，派機把胡適之先生接到南京。胡適到了南京，蔣經國代表老總統在夫子廟的大聚成飯館設宴。大聚成的紹

興酒遠近馳名，其特色是用錫壺盛酒，每人一壺。那天在座七人喝了十幾壺；胡適猛喝酒，很少講話，流亡心情配上悶酒，那晚的胡適，酒入愁腸，化成多少惆悵。他的心情，不問可知！

老總統六十大壽，大聚成準備了四罈陳年花彫賀壽。蔣經國還特別拿了一罈送我。多年後我以此酒招待參加治凡婚禮的賀客。

1946年，蔣經國被派往長春任東北特派員，我也曾去看過他。他每到北平，總是先與戴笠（雨農）見面，也常到當年東三省長吳俊陞，外號吳大舌頭的兒子吳幼泉家中吃飯。吳家在北平住處是一座深宅大院，有俄國幫傭，非常氣派，不脫當年北平大戶人家的樣子。聽戲則外會到家，連修腳搓背都把師父喚到家服務。對我來講頗不習慣，但情義難卻，更無資格拒絕。

1946年正月，我飛蔣夫人去長春與俄軍談判，周至柔將軍、董顯光博士及孔二小姐等人同行。飛抵長春機場時，正下大雪，天氣酷寒。蔣夫人下機後，有身著皮衣皮帽之俄軍將領多人迎候，並在機旁以俄語發表冗長歡迎詞，夫人佇立良久。在如此寒天中有此動作，令人難解，似可解讀為「整人」吧！

其後俄軍又以盛大宴會，歡迎蔣夫人一行。席間蔣夫人曾以國語，在答詞中講了一個比喻，形容中俄應有的合作精神。她說：「一對夫妻要在一個山坡地蓋一間房屋，先生喜歡山頂，太太則中意山腳，照理應蓋在山

腰；但幾經議論，結果還是把房子蓋在山頂。」她強調這種一面倒的合作，不足為訓。夫人的口才與機智，令我十分佩服。那些日子，經國隨侍在旁，並兼充翻譯。

在長春期間，我們偷閒逛馬路，看見很多日本人擺地攤賣舊家用品，我在一個攤上以很便宜的價錢，買了一套百餘件的Noritake瓷器；擺地攤的人是一位中年婦人和一位年輕小姐，狀似母女。她們儀態端莊，衣著素淨，舉止沉著，顯非泛泛之輩。據陪伴的人告知：日軍投降後，很多日本高官貴族被列為戰犯逮捕。而他們的家屬則紛紛求售家產，匆匆返國。賣給我瓷器的母女，想必也是其中之一。每思及此，益令人慨嘆世事多變，戰爭的冷酷，人生的難料，全顯現在一套瓷器上。

第7節 上海打老虎

蔣經國在長春沒待多久，即返回南京。1948年，大陸情勢逆轉，國軍節節敗退，而全國經濟亦陷入混亂。蔣經國被派去上海「打老虎」，方良也搬去上海，住在原租界內一幢「十四層樓」公寓中。我夫妻有時也去上海探望他們。蔣經國上海打虎的故事，多有報導，假設真能認真打下去，雖不能扭轉時局，但相信當時的經濟不致垮得那麼快。可惜應了一句俗語，弄了個「虎頭蛇尾」，無功而退！

記得有次我接蔣夫人返南京。在龍華機場登機後，

經國送行，並登上飛機與夫人談了相當時間；他下機時，面色凝重。自那時起，上海打虎之風漸息，我猜想與那次見面有關。蔣經國旋即返回南京，此後國共戰爭的局勢，江河日下，金元券的失敗，更使整個經濟垮台。共軍節節進逼，徐蚌會戰失利，雙堆集戰役慘敗，共軍有直搗南京之勢。

那時在上海還有王新衡夫婦。王是蔣經國留俄同學，在南京時代被選為立法委員，大陸失守後被派去香港工作，遭人槍擊，幾乎送命；幸來台治療，得以完全康復。在爾後的日子，我們過從甚密。新衡夫婦講義氣、夠朋友，對政治的看法也很高明。惜新衡於1987年1月因心臟病去世，新衡嫂至今仍為我夫妻好友。

在台灣，蔣經國、新衡與我們三家多有過往。蔣經國將最鍾愛的獨女孝章，做瑛華的乾女兒，曾正式擺宴行禮。而孝武則認新衡做乾爸，我們三人成了乾親家。

第8節 撤離大陸

此時，國內反「蔣」聲浪高漲，蔣先生於1949年元月宣告下野。我飛「中美號」專機送老先生及經國，先飛杭州笕橋；再飛寧波。他們一行去了溪口，我則飛返南京，後又撤到上海。1949年5月上海失守，又匆忙撤退，飛到舟山群島的定海。當時經國隨老先生駐節漢陽軍艦，艦長就是黎玉璽將軍。江南戰事急轉直下，老先

生和經國等一行離開舟山，首飛金門上空繞了一圈，而後在馬公降落。幾天後飛到台灣桃園機場，住進大溪別館。我則飛返嘉義空軍第十大隊駐地。

在我飛老總統去杭州笕橋的頭天下午，他召集在京將領訓話，我也奉命參與。他以極沈痛的語氣說：「八年抗戰，勝利不容易，這是國家千載難逢的機會。但勝利果實被我們糟蹋了，以後再有機會，千萬不要犯同樣的錯誤。」老總統說得很真摯，也很感人！

1950年我載蔣經國飛到馬尼拉迎接蔣夫人；她是由美國經菲律賓返台，在馬尼拉由當時的陳質平大使款待。據悉這位大使是戴笠的人，對經國先生非常殷勤，買了不少禮物送給經國。

1951年我奉調台北空軍總部作戰署副署長，兼總統座機機長，家則仍住嘉義，故這一段時間與經國見面較多。他那時忙著「黨的改造」，我則奉派進入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期間方良常送食品，快我朵頤，其情誼至值珍惜。結業後，空軍總部有些人事異動，周至柔將軍調參謀總長，我向他表達了想到美國當空軍武官的意願，他即答允，並報告總統。等了很久，毫無下文，當時經國勸我不必急著出國，但後來他明白我與王叔銘總司令理念不盡相合，最後還是批准了。

第9節 訪問美國

我於1952年5月攜眷赴美上任，揮別了十年飛總統座機的生涯。期間經國首次赴美訪問，到達華府的當天，就到我家晤聚。隨他來的還有四位美方安全人員，我家不大，只好請他們在院中休息。他在華府期間的社交活動，我夫婦皆應邀參加。其中記憶最深刻的一次，是顧維鈞大使夫婦的歡迎晚宴，邀請了剛剛當選的美國副總統尼克森、國務卿杜勒斯、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國防部長威爾森、眾院議長馬丁及資深參議員諾蘭，還有中國之友周以德議員等華府政要。此次宴會真是冠蓋雲集。

為排座次，大使館特別邀請美政府的禮賓司專家來協助，因為客人們的官職和資歷非常複雜，而應邀貴賓都很在乎座次；好在禮賓司人員深諳此道，所以安排得都很恰當。但在席間發生了兩項小插曲：

先是在主人致詞後，美方應有一資深人員致答詞。那時尼克森雖身為副總統，但資歷尚淺，自不能代表發言。而眾院議長馬丁和參議員諾蘭卻同時起立，爭先致詞，場面非常尷尬；僵持了半分鐘後，才由馬丁先講。

宴席最後，由主客蔣經國起立敬酒。他站起來手舉酒杯，向大家敬酒致謝，弄得那些洋人面面相覷，不知所措。原來西洋規矩，在正式宴會上敬酒（toast），通常是由某人請大家起立舉杯，向某特定人士（主客或

主人)敬酒；而被敬者，則僅須點頭致意，不必起立或對飲。換言之，應請大家同敬一人，而不是由一人敬大家。結果，還是由顧大使請大家都站起來共飲一杯，才化解了此一窘困場面。

我想這主要是我外交部在我大員出國訪問前的簡報，不夠清楚；也或許我們有些大官平日習慣主動、不大重視對方習俗和感受所致。正如我們一些高級軍官在打高爾夫球時，離洞數尺，就算進洞「給啦」！但外國人打球，都很認真嚴格，即或離洞數寸，也得把球打進才算。而我大官們卻抱怨「這麼近，還不給？」此雖是遊戲，但我們有些人的風度實在很差。由這些小地方也可看出一些人的官僚作風。如果上行下效，其官箴及軍紀便敗壞無遺了。

第10節 我回國後與蔣經國的交情

1955年，我奉調返國。於12月8日攜眷搭美軍運輸艦「帕特里克將軍號」抵達基隆。蔣方良親去碼頭接我們，並安排我們暫住他們在陽明山的房子。當晚和爾後數日，多在台北市四條通蔣家用餐；直到我們在新生南路的房子修好，才搬下山來。

其間，蔣經國派了一部汽車供我使用。有一天，他對我說，將我派任為空軍總部情報署署長。在他認為這項派任，是對我的知遇，但我對情報業務，並無多大興

趣。由於他的美意，我仍然赴任。

同時他還帶我去劍潭（安全局所在地）的「草廬」看了一下，告訴我也可在那裡辦公。原來草廬是他自己所用，我雖常被召參加安全局會報，但我的工作是在空軍總部，所以從未使用草廬。

他這個安排及爾後許多動作，在在表示他對我的愛護；我除心存感激外，從未利用這種關係，做任何分外之事。可是外人看起來或不做此想，難免產生誤會或忌妒。我始終以國家軍人自重，即我不屬私人，也不屬派系；內心坦蕩，不計他人看法。這是我的天真，也許因此被陷，然而我無悔無怨；縱或時光倒流，我仍會堅持同樣的從公原則。

第11節 蔣經國與美國駐台單位

在1955至1966的十年中，我曾隨蔣經國訪外島、探監獄、下小館、看電影，大約每週都見面。在工作方面，我成了他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台單位主管的主要連絡人，先是德根（Bill Duggan），後來是克萊恩、福特（Harold Ford）及納爾遜（Nelson）等人。他與克萊恩的接觸最多，克的太太Peggy並一口氣給蔣經國上了一百堂英文課，中間毫無間斷。我很佩服Peggy的殷勤和蔣經國的毅力。

克萊恩畢業於哈佛大學，身材矮胖，對蔣經國用心良苦；無論公私一切均隨蔣意，吃喝隨俗，宛若知友，

但私下有時卻向我透露不滿和無奈。有一次，他向我出示一份美國國務院的報告，報告中歷述了我方私下採購軍品、訓練特種部隊、準備軍事反攻等，並附有照片，令克萊恩查報。我想那些資料多為美軍顧問團人員所供給，因為美軍人員布署在我軍各個角落，我方行動他們瞭若指掌；而所報各節，據我所知均為事實。克向我提出此事，我則推說是局外人，不予回答。只是問他為何不向副秘書長（即蔣經國）提出？我想這類對我政府不利的事，他大概不會明講。克萊恩於任期滿後調歐洲工作，由福特接任CIA台灣負責人，但福氏則遠不及克某圓滑。

應更正為1979

1970年中美斷交後，在一次酒會中，克萊恩提到了當年合作的愉快日子。我則答以「台灣方面為雙方合作，犧牲了很多性命（指U-2及ECM Operation），而你們卻把我們棄之如敝屣（push us down the drain），與中共建交。過去有什麼可回想的好日子（good old days）？」他及在座的美國人均默然無語。我無意責備他們，但所言均為事實。回想起來，我們所做的賠本生意太多。時至今日，似乎仍沒有改進！

後來克萊恩退休，任職喬治華盛頓大學「戰略研究中心」。曾以太平洋盆地為主軸，寫了一本戰略研究。

他有時來台灣訪問，我曾問他是否拿我國政府的錢？他說：「沒有。」並說他們的經費來自「洛克菲勒基金會」；我說：「這樣很好，如此，才可保持超然獨

立的立場。」但後來聽說他接受台灣官方及私人的經濟支持，「兜攬」替台灣遊說的廣告，我希望那是傳聞。他在1996年去世之前的事業與地位，已不大為人所重視。可見政治人物欲持盈保泰，不墮塵情，多麼不易！

在經國先生方面，他表面上雖與美方很融洽，但有些事也未向美方公開，如私訪越泰、建立緬越邊境中國游擊武力等。國際間本來就沒有真正的友誼，情報業務更是互相利用，原無可厚非；但在那些年裡，我方多處於被動，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特別是在雙方目標迥異之下，美方對我多所敷衍，我方一心要反攻大陸，而美方卻毫無此意願，僅是利用台灣的戰略地位來對付中共而已。我方強調美國應幫助我反攻，但美方雖反共，卻不願捲入我「反攻大陸」的漩渦，所以一直在敷衍，直到1979年正式放棄我們為止。是故，人要自強，國家更何能不靠自己，而妄想求助他人以自保呢？

蔣經國代表中方與美國中情局駐台機構美海軍通訊中心主要的合作事項，是對中國大陸的情報蒐集，其中以U-2及ECM（電子偵測）成效最著；其次則是電訊蒐集，有空軍情報署所轄的「技術大隊」及國防部的「技術情報室」（魏大銘所主持的電訊攔截單位），再其次是諜報工作。對後者我非常存疑，我始終認為共黨是諜報專家，而當時大陸對人民控制之嚴，實在難以滲透，哪裡來那麼多敵後諜報。後來有人說，很多諜報根本是港澳及印緬一帶發來的電報，冒稱敵後，欺瞞當局。

第12節 陪同視察

在那十年中，印象極深刻的一件事，是約在1957年前後，蔣經國突然對我說：「一起去西貢看一看！」那時越南是由吳廷琰擔任總統，蔣派王昇到越南替越軍組織政工。我們去的那次是一次詭異的行動。在西貢待了兩天後，我飛蔣經國去金三角看游擊隊，我們降落在「大興碼頭」（前文已有介紹）。

之後，即騎馬到柳元麟司令的游擊隊總部。那裡生活很苦，瘴氣瀰漫，我們稍停休息，即見無數螞蝗掉在馬身上吸血，當然也會掉在人身上，情形極為可怕！由柳總部，我們乘船沿瀾滄江南下，到達一小村，那裡有一些由大陸逃去的難民，也有幾位我政府人員在那裡工作，設有電台與台灣連絡。

金三角之後，我們又趁夜「偷」去了一趟曼谷。我只通知了當時駐泰武官朱國勳上校，請他絕對保密。我們夜間降落曼谷，由朱武官接我們去他家吃點東西，然後，在曼谷轉了一圈後登機返台。我以為此行甚密，孰料終為杭立武大使獲悉，並向朱武官興師問罪。以蔣經國的身分，進入友邦，既不請准當地政府，又不通知本國大使，真是違背國際禮儀，甚至國際法。這種荒唐事，無怪杭大使光火。

在那些日子裡，我有時也陪蔣經國視察橫貫公路。負責該工程的主管，是公路局局長林則彬，人很踏實，不辭艱苦地屢陪蔣經國翻山越嶺，視察工地。有一次我

夫妻奉邀陪同一群美軍顧問團及眷屬去梨山觀光。那時正值冬天，巧遇大雪，一片粉妝玉琢的銀色世界，雪花紛飛，冷月無聲，景緻美極。

晚上宴會，觥籌交錯，多數人喝得酩酊大醉。那時尚無賓館，住在草屋，晚會亦在大草棚舉行。大夥酒酣時，群起歌舞，隨興歡愉。那次台灣省主席黃杰（達公）亦在座，他本是一位保守穩重的人，但受到歡樂氣氛的感染，竟也加入了狂歡群。

在酒後他向我提起張光蘊的事。張是空軍官校六期同學，人很優秀，在嘉義任空軍四大隊長時與我熟稔；不知何故，被控「通匪」下獄。黃達公也認識他，並且和我一致認為他是冤枉的；黃杰催我趁著大家狂歡時，去向經國先生「說情」。我慨然照辦，蔣經國亦答應即刻去查。等我們返回台北不久，光蘊即獲釋回家。在我為光蘊高興之餘，也令我頗為驚訝：蔣經國的權力之大，遠非我能想像得到的。

蔣經國也常約我到外島視察。記得有次到金門，邀請了當時負責美對台經援的白藍德（Joe Brendt）和他的夫人。白藍德太太在台灣教英文，學生很多是低階軍官。到金門後，他們夫婦被一些學生請去；我則隨蔣經國參加幾位駐軍首長的晚宴。飯後他們才告訴我，那些冷盤、炒菜及火鍋等均為狗肉，我為此反胃噁心了好幾天，也首次知道，蔣經國喜歡吃狗肉。

第13節 蔣家的孩子

蔣經國四個小孩都與我相熟。我在贛州時就見過孝文及孝章，在九龍坡時期，我曾經教他們跳舞；小孩子們興致勃勃，每次我去，都拉著要學跳舞。

四個孩子中，蔣經國確實很愛孝文。一個原因是孝文於1935年12月生於俄國，那時正是蔣經國和方良一生中最艱苦困頓的日子；這個孩子的出生，帶給他們極大的歡欣鼓舞和奮鬥的力量。孝文兩歲時，蔣經國一家三口終於返國，蔣經國的一生從此改觀。

另外一個原因，在於孝文五官深邃，英俊挺拔，給人一種英氣不凡的感覺。而他酷似保羅·紐曼的淡藍色瞳仁，散發出迷人的魅力。讓身材短小的蔣經國，以擁有這樣的兒子為傲。

孝文的個性直爽親切，所以朋友多。成功中學畢業後，他告訴我不願去讀陸軍官校，但是祖父和父親的命令難違，不得已進入官校。外向好玩的孝文，不適應嚴格的軍事訓練，時常跳牆出去玩，呼朋引伴，飲酒作樂，讓校長很頭痛。蔣經國頗為不悅，命孝文暫住西子灣，讓我去看他。

我見到孝文，他一副愁眉不展的樣子，滿口怨言。後來他拿了張拉娜·透納的照片給我看，告訴我他還寫了封信給她；可見孝文對軍校的反感，而做了些反常的動作。我回到台北告訴蔣經國：「艾倫（孝文的英文

名字)軍校是讀不下去了。」並婉轉地表述不宜勉強孩子，去做他不願做的事。

蔣經國雖然失望，但是愛子心切，乃將孝文送往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讀工商管理，後來轉至華盛頓就讀。孝文在美愛開快車，常常出事，都是由國務院出面，到警察局保人。中情局有時也會順便將孝文的情形告訴蔣經國。

孝文在華盛頓的日子，過得並不順心，蔣經國談起孝文就嘆氣。1962年7月，孝文在華盛頓的寓所遭竊，共計損失中國玉石、太太的鑽石與珍珠飾物甚多，價值有數萬美金。當時孝文妻子徐乃錦女士才二十四歲，她為革命先烈徐錫麟孫女，正在華盛頓一所天主教大學攻讀戲劇。本案如何結束，則不得而知。

竊案發生後三個月，孝文返國。蔣經國說：「交給孫運璿吧！」那時父子的感情已經不佳，孝文是我見過在蔣經國生命中唯一拿他沒辦法的人。

後來孝文在台灣電力公司做得不錯，先擔任台電副管理師，再調升台北區管理處北郊分處主任，再擢升為桃園區管理處經理。對此，蔣經國稍感滿意，認為總算浪子回頭。我有時去大溪，視察空軍監察大隊（截聽電訊的單位）時，就順道去桃園看孝文。

1966年我入看守所，和孝文失去了聯絡。1970年底聽到他腦部受創昏迷的消息，心中很難受。

孝章是蔣經國的獨生女，自然受到父親寵愛。孝章

也是瑛華的乾女兒，與我家熟悉。蔣經國稱呼孝章為「艾咪」，取其諧音「愛民」之意。

孝章是蔣家四個小孩中最內向的一個，但是她和俞大維兒子俞揚和的戀情，倒是鬧得滿城風雨。

俞大維頗得陳誠賞識，陳派俞赴美主持軍購。俞大維謹守分寸，與駐美大使顧維鈞各司其職。俞揚和則與他太太蓓蒂與俞大維夫婦同住，以照顧雙親。

我於1952年赴美，與俞家相識，也很友好。兩家太太們常在一起打小牌，牌搭子還有桂永清太太。1955年我奉調返國，先讓出武官官舍，搬到俞家住了一段時間。返國後兩家仍保持聯絡。

孝章高中畢業後想讀東海大學，蔣經國特別為愛女給東海校長曾約農寫了封信。曾回信很妙，大意是，按規定入校一定要考試，但為尊敬總統起見，特准免考入學等語。蔣經國看到「按規定」、「為尊敬總統」這些字眼，很覺刺眼，決定不讓孝章讀東海大學。蔣經國之給東海寫信，也許愛女心切，稍欠考慮；但他不讓子女靠關係獲得利益的想法，卻一向堅定，也頗令人佩服。後來他的三子孝勇如何進入台大，則不得而知，只知道那時台大校長是閻振興先生。

後來孝章赴美，就讀舊金山米爾司學院（Mills College）。當時俞揚和也在美國，誰知兩人迸出愛情火花。東海大學的一封信，改變了兩個人的命運。

兩人的愛情火，讓蔣經國大為光火。那一陣子他心情很壞，因為俞揚和不僅年紀太大，而且有家室，太太蓓蒂曾是空中小姐；最要命的是蓓蒂已是俞揚和的第二任妻子。

由於蔣經國的反對，父女鬧得不愉快。蔣經國找我去，交代我一個任務，要我趁赴美之便，去設法拆散兩人的關係。

我一輩子軍人，奉命破壞敵人設施不足為奇，此次受託破壞人家感情，倒是新鮮事，而且困難度很高。所幸我赴美另有公務，對兩小之事只是就便辦理而已。等我到了舊金山，找到孝章，當時她與孝文住在一起，經常與揚和在電話中情話綿綿。我一看這種情況，就知道完成使命是不可能的了。回國後將此情告知蔣經國，他在無奈中，親自找上了俞大維。俞告訴蔣：「我也反對這門婚事，但孩子長大了，我實在無力干涉其事。」後來兩人做了親家，蔣經國雖然極不滿意這門婚事，但對俞大維仍執禮甚恭，有時會贈送食品給俞大維；俞則回贈書刊。兩人就一直「食品換書刊」的禮尚往來。

俞大維曾當面告訴蔣經國：「要行仁政。」俞也曾親口告訴我：「蔣中正對我很好，但從未把我看作心腹。」孝章結婚後，揚和一度曾在中華航空公司兼顧問職，後來不知何故，去了一家中國人開的輪船公司工作。蔣經國對這個女婿，無可奈何地不得不接受，關係一直若即若離。

孝武在四個孩子中最聰明伶俐。但是他小時候得過肺病，常常臥床。或許是這個病造成他個性比較極端，愛憎分明，相當陰沉。

孝勇完全老么模樣，可愛頑皮，好動直爽，做人非常痛快。曾任幾家公營事業的董事長，後來攜眷移居加拿大及美國。1997年英年早逝，生前著有一書，痛批當道。

縱觀蔣經國後代，三位公子早逝，僅存孝章「隱居」美國。四十年人事滄桑，令人扼腕！

第14節 再評蔣經國

我與蔣經國相識二十三年，但我自認從來不是「蔣經國人馬」。在公職上，我是國家的軍人，時時以國家為念，所以公事上與蔣經國往來，嚴格自我約束，冷靜反躬自省。蔣經國在這方面也是個公私分明、謹守分際的人，他不喜歡自己的親朋好友招搖弄權，我倆這點個性十分相同。要想與蔣經國保持友好關係，必須有這樣的風骨和氣宇。我自信在私誼上，一向持虔敬無欲之心，曠達接物用世，內心光風霽月。如此相處，才能彼此尊重，可親而不可犯。

抱持此般胸懷與心態，我與蔣經國，公事往來，不憂不懼；私誼交往，不惑不亂。如此相處，庶幾不卑不亢，氣度高邁，自得一番逍遙，這也許是蔣經國喜歡來我家、常邀我一同出遊的主因。他要的是真正的朋友，

在他的知己圖譜中，少有攀權附勢之輩；在他的朋友族群中，鮮見軟骨動物。據我所識，如王新衡、嚴靈峰等人是也。

但是有些人看到我與蔣經國往來密切頻繁，將我貼上「蔣經國人馬」的標籤。這不僅錯看了我，也看扁了蔣經國。我痛恨這種標籤，蔣經國更不喜歡這種說法。他憎惡別人打著他的名號，在外招搖。唯有「君子守常」，才會產生純正的友誼。

蔣氏最喜歡讀的書籍，除了呂坤的《呻吟語》外，就是《菜根譚》。《菜根譚》中有一段話，或可反映我對人交往的心境：「古德云：『竹影掃階塵不動，月輪穿沼水無痕。』古儒云：『水流任急境常靜，花落雖頻意自閒。』人常持此意，以應事接物，身心何等自在！」

人待我以友，我敬人以朋。我知道蔣經國位高權重，有一天，我把在戰前國文老師講解的一課〈三習一弊疏〉送給他一份。那是清朝孫家淦（勝公）呈乾隆的一篇奏疏，勸他嚴防目習耳習心習，以免陷入遠君子親小人之弊。結果乾隆還是用了巨奸和珅，害民誤國。蔣曾告訴我：他曾把這篇文章呈給老總統看。我希望歷史能證明蔣經國不是這樣的人。以我個人的體認及觀察，蔣經國在出掌大權之後，似乎未受三習之害；但他知人是否明，用人是否當，仍有待商榷。他厭棄小人是實，但有無做到選賢與能，則尚待公論。



1953年我任駐美空軍武官時，蔣經國來美訪問，致贈其親筆簽名之全家福。



1950年代蔣、衣兩家在台北新生南路我宅合影。

前左起：復得、本人、孝文、治凡、經國。

後左起：孝勇、方良、穎凡、孝章、艾凡、瑛華、淑凡。

後立者為孝武。



1960年前後，本人（前左）隨同蔣經國先生（右）視察緬甸邊境我游擊隊基地後，乘小艇沿瀾滄江下游抵湄公河慰問我難民營。後方中立者為孔令晟將軍。



東西橫貫公路修築期中，經常應蔣經國先生之邀同遊梨山。與蔣經國（左一）、陳嘉尚（左二，空軍總司令）、黃杰（左三，台灣省主席）合影，背景呈現梨山之原始風景。